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共謀式對抗的快感新陳代謝

The Enjoyment Metabolism of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doi:10.6752/JCS.201403_(18).0004

文化研究, (18),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 2014

作者/Author：張維元(Wei-Yuan Chang)

頁數/Page：91-12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The Enjoyment Metabolism of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Wei-Yuan Chang

共謀式對抗的快感新陳代謝

張維元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對本文提出諸多具生產性的意見與批評。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Erdem Damar, Jason Glynos與Aletta Norval在研究不同階段與筆者的討論與建議使筆者獲益良多，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王思穎對本文後期寫作的建議大大增加本文可讀性，在此一併致謝。本文若有錯誤疏漏，為筆者個人責任。

張維元，University of Essex意識形態與論述分析博士、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james.66@yahoo.com.tw

摘要

本文將引介「平行共謀式對抗」(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這一概念，並從「快感(enjoyment)分析」的角度來釐清其組建機制。「平行共謀式對抗」指的是以下這種並非不常見的情況：我們可以清楚的感知到在許多的政治對抗中，對抗的雙方似乎奇異地對相互抗爭這件本該是相當痛苦惱人的事情「上癮」了！交戰的雙方激情的擁抱對抗，一種難以理解的快感在此被持續生產出來，並供對抗雙方的人民汲取，用俗語來說，這是一種「酣戰」或「越打越難以罷手」的狀況。在此，「對抗」奇異地成為快感生產的基址。在這種類型的對抗中，弔詭地，對抗的雙方似乎在快感的層次上是「共謀的」(complicit)。本研究將以Jacques Lacan的快感分析理論為基礎來說明這種共謀對抗的快感組建機制。研究論述將分為以下幾個部份：第一部份檢視「平行共謀式」對抗在現有理論與研究文獻中的現身痕跡；第二部份則通過挪用與延伸Lacan的快感分析理論中的邪僻快感(perverse enjoyment)概念來詮釋性分析「共謀的對抗」的組建機制；第三部份將以上的分析置入精神分析理論與後結構主義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理論的概念脈絡中以突顯「共謀的對抗」此一概念的位置，此一「位置的突顯」將同時涉及此一概念的獨特性、它與當代政治狀況的相關性與此一概念在使用時應有的限制性。

關鍵詞：Lacan、Lacalu、Žižek、基進民主、快感、對抗、衝突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notion of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The notion of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refers to the form of antagonism in which both of the antagonistic sides draw enjoyment from conspiring to prolong and escalate the antagonistic situation. I consider this notion 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analysing political antagonism because this notion can make salient the role of enjoyment in political antagonism. This article will firstly give a brief review of the analytical observations of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in scholarly literature. I will then provide a Lacani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enjoyment in 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 Finally, I will put my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ent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on the notion of 'antagonism' to show the contrib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this notion.

Keywords: Jacques Lacan, Ernesto Lacalu, Slavoj Žižek, radical democracy, enjoyment, antagonism

airiti

盧梭(Rousseau)曾解釋道，自然狀態中的人性狀態必然是良善的，或至少不是卑鄙的。這一命題並非一個樂觀主義的宣言；它是一個邏輯性宣言……自然狀態中的人性不可能卑鄙，因為使卑鄙可運作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於那裏。自然狀態乃一個人面對物體的狀態，而不是面對彼此……〔盧梭說道〕「在那裏，一個完全的戰爭狀態奔騰蔓延，大地卻是一片祥和……」

——Gilles Deleuze(2004: 52)

一、引言：「平行共謀式對抗」的現象性描述

本文試圖引介「平行共謀式對抗」(paralleocomplicit antagonism)這一概念，並從快感(enjoyment)分析的角度來釐清其組建機制。「平行共謀的對抗」指涉的是以下這種並非不常見的情況：在激烈對壘的政治對抗中，一方面，對抗的雙方常常說著相互沒有交集的話語，但另一方面，相互對抗的情勢並不會因為此一話語的無交集而降低，相反的，敵意可以無限升高。

「平行共謀的對抗」這一現象所涉及的第一個奇異點在於其「平行」(parallel)特質，在語言與論述(discourse)的層次上，對抗的雙方明顯處於一種「無交集」的狀態，從而使雙方在衝突中「錯過」了對方，此乃為何這一種對抗衝突的形構(antagonistic formation)可被稱為「平行的」。我們只須回想一下2006年台灣的「民主內戰」紅衫軍事件即可理解此一荒謬，當紅衫軍高舉「反貪腐」時，對抗紅衫軍的力量卻在說著「保衛本土政權」。這種「平行的對抗」並非不常見，儘管與紅衫軍事件的地緣政治、導因與嚴重性天差地別，在911事件後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對峙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平行對抗」：「保衛自由」vs.「對抗帝國主義」。

另一方面，從我們的經驗可知，衝突雙方的敵意並不會因為這一語言論述的無交集狀態而降低，相反的，這一語言論述的非交戰狀態反而可以讓對抗衝突的張力無限升級，這是「平行共謀式對抗」的第

二個奇異點，其「共謀性」(complicity)，而此一特點之難解程度更勝於其「平行性」。在此的「共謀性」指涉的是以下狀況：交戰的雙方越是激情的擁抱自己的語言，敵意越是升高，而在這一升高的過程中，一種難以理解的快感可以被持續生產出來，並供對抗雙方的人民汲取。用俗語來說，這是一種「酣戰」或「越打越有趣」的狀況。在此，「對抗」奇異地成為快感的生產基址，而對抗的雙方似乎對相互抗爭這件本該是相當惱人的事情「上癮」了！弔詭地，對抗中兩組論述平行且相互錯失的雙方，在快感的層次上卻「共謀的」。因為以上的現象性描述，筆者稱這種對抗為「平行共謀的對抗」。

本文將以Jacques Lacan的快感分析理論為基礎來說明「平行共謀式對抗」的快感組構機制。文本以下分為幾個部份：第一部份檢視「平行共謀式對抗」在現有理論與研究文獻中的現身痕跡；第二部份則通過挪用與延伸Lacan快感分析理論中的邪僻快感(perverse enjoyment)¹概念來詮釋性分析「平行共謀對抗」的快感組建機制；第三部份將以上的分析置入後結構主義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理論中於「政治對抗／衝突」(political antagonism)的辯論以突顯「平行共謀式對抗」此一概念的位置，此一「位置的突顯」將同時涉及此一概念的獨特性、它與當代政治狀況的相關性及此一概念在使用時應有的限制性。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企圖是相當有限的，其限制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本文著重的是分析「平行共謀式對抗」這種意識形態式抗爭的快感新陳代謝，對於如何突破這種意識形態快感封鎖並做出具生產性的政治行動與抗爭這一點，本文只稍微觸及，更深入的論述則留待日後研究專論；第二，儘管本文使用許多Lacan與Žižek的精神分析概念，但本文並非以引介他們的理論為重心。這些概念在本文中的角色為概念

1 “Perversion”一般翻譯為「倒錯」且為中文日常用語之一，儘管中文版的《精神分析辭彙》仍將此辭譯為「倒錯」(參見Laplanche and Pontalis, 2000: 331-334)，但因為這一詞彙承擔了過多日常使用的成見，國內精神分析的文化研究者基本上避開「倒錯」這一中譯，如劉紀蕙曾將其譯成「泛轉」(劉紀蕙 2000)或「變異」(劉紀蕙 2004)。本文將其譯為「邪僻」，理由詳後。

工具，通過對這些概念工具做出引申來分析「平行共謀式」對抗的快感；第三，如前所述，本文最後選擇以基進民主理論中對於「政治對抗／衝突」的辯論脈絡作為背景，來凸顯「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概念的獨特性與限制性。做出此一選擇背後的理由乃因為基進民主理論為當代政治理論中對於「政治對抗／衝突」這種政治實踐之可能潛力著墨最多的理論傳統。透過將「平行共謀式對抗」置入基進民主理論中對於「政治對抗／衝突」的辯論脈絡，本文將可以說明「平行共謀式對抗」乃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對抗形式，並說明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對抗形態對於政治行動之潛力的封鎖，在此設定下，當代精神分析理論（特別是Žižek的理論）與基進民主的複雜關係在本文中將不多做討論。²

二、現有文獻中「平行共謀式對抗」的痕跡

本節引介部分文獻以說明現有國內學術文獻已對「平行共謀式」的對抗／衝突有所察覺，這一部份的文獻檢閱有其限制性，因為這裡所檢閱的國內文獻都是曾經直接面對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現象的論述文字，而由此排除了間接觸及這一現象的學術論述（林淑芬 2005）。儘管有這個限制，此一鋪陳仍是具建設性的，因為它將為我們準備好一個後續介入討論的基礎框架與進路。

首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學者群引介的南韓學者白樂晴「分斷體制」(division system)理論中已可以看見「共謀對抗」的痕跡（請參見陳光興、白永瑞 2010）。白樂晴的「分斷體制」理論乃一解釋南北韓分裂及此一分裂與東北亞甚至全世界關係的理論，其內涵深廣，在此不一一討論，筆者特別重視的是理論中提到的讓南北韓雙方持續生產敵意的共謀機制。這一共謀機制指涉的是既存政權以分裂的事實為基礎來讓自己續存，甚至增強自己的權力正當性。當南北韓間發生事端時，事端發生的歷史性脈絡與原因隨即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一

2 基進民主理論與Žižek間的爭論請特別參見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2000)。

整套多年來持續操練的「劇本」：對南方來說，這一（或「任一」）事端再次證明了北方共產主義的瘋狂，而美日艦隊不可避免的介入，對北方來說，則是「又」再次證明了南方與帝國主義的共謀，由此，北方可以鼓動群眾來對抗帝國主義並升高對抗情勢，而這一舉動則再度激怒南方——其結果是，一個惡行循環就此展開，而雙方政權則可以藉此號召群眾聚集於政府領導之下，簡言之，對外的衝突被用以「鞏固（己方）領導中心」，並避免任何實質性改變的發生（陳光興 2008：224-226；趙剛 2009：86）。

此外，「平行共謀式對抗」在Jean Baudrillard的《波灣戰爭不曾發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與《恐怖主義的精靈》(The Spirit of Terrorism)這兩本討論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對峙的著作中也有所觸及，但或許是因為Baudrillard的寫作風格，「平行共謀式對抗」的論述痕跡在文本中被埋的很深。學者朱元鴻在他為兩書中譯本所作的序言文章中精準地的將此論點挑出（朱元鴻 2003、2006），並將其命名為「意識形態的共謀」（朱元鴻 2003：16）與「誘惑／挑戰的共謀」（朱元鴻 2006：16）。

在以「意識形態的共謀」鎖定《波灣戰爭不曾發生》一書的閱讀重心時，朱元鴻特別注重Baudrillard認為波灣戰爭的再現場景如同一場荒謬的遊戲或道德劇這一論點，即：一方面，西方世界「希望」海珊是邪惡的，因為如此一來，西方世界就可以「合理地」吹捧自身的人道精神，並同時「科技矯飾主義」(technological mannerism) (Baudrillard 1995: 34)地炫耀自己的先進武器；另一方面，海珊也「希望」西方世界作出這些惱人的炫耀性軍事行動，因為他明白這些炫耀將激起阿拉伯世界對西方更大的反感，海珊便可藉此情緒將自己打造為中東世界反西方的標竿，並由此鞏固自身的權力。而以「誘惑／挑戰的共謀」此一論點來討論911事件時，朱元鴻更是直接面對《恐怖主義的幽靈》一書中最大膽也最挑釁的聲言，即Baudrillard認為恐怖分子在911中的奇觀化殘酷行動乃是西方世界自己所渴望已久之事——「他們〔恐怖分子〕所作的，正是我們自己〔西方世界〕所渴望的！」（Baudrillard 2002：5，強調為原文所有）。如朱元鴻（2003: 16）指出的，儘管「這句話惹毛了很多人」，但這個論斷的確

點出了911事件背後最難堪的邏輯：誘惑／挑戰的共謀策略之「對反於溝通策略」，而「正是在不溝通不談判不妥協的情況下，挑戰／誘惑的兩方得以共享著相互增進權力而且繼續升級的共謀秘密」（ibid.: 19-20）。朱元鴻繼續指出，一方面，這一共謀增權可見於小布希政權利用911事件以啟動「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而推出「愛國法案」以懸置民主法權、削弱國會權力、擴張行政裁量權力之行動。此外，更有其他學者將這一說法更推進一步，認為911後美國的作為——如「愛國法案」的推出——不過是結晶化了美國在911之前就已經在預備的政治作為（參見 Passavant and Dean 2004），白話點說，911提供了藉口讓美國去做它早就想做的事；另一方面，恐怖組織也期待著美國的過度回應，因為如此一來，美國不但將加速扯下自己的民主道德旗幟、失去在世界上已經少得可憐的盟友，更可以加速激進組織的擴張（Baudrillard 2002: 17-19）。朱元鴻似乎想告訴我們，除了直覺式的反對、作噁，這一難堪的「他們所作的，正是我們自己所想要的！」似乎很難「只」用Baudrillard的殘酷與「白目」來全面解釋。

不管是白樂晴、朱元鴻或Baudrillard都已經指出了「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邏輯結構的現身，但一方面，他們的解釋似乎仍有不足之處。白樂晴的觀察只是其「分斷體制」理論的一部份；而Baudrillard則缺乏適當的理論詞彙以分析這種對抗共謀的內部機制；朱元鴻對Baudrillard的解釋儘管挑出了其精要之處，但在進行解釋時，仍不得不以回歸事實（如「愛國法案」）的討論策略來印證Baudrillard之理論性命題，而無法深入這種對抗型態的內部組建機制。

由上可知，儘管「平行共謀的對抗」在文獻中已有現身，而我們所缺乏的是一套詮釋性分析以「內在地」說明這種共謀對抗之內部結構的問題。筆者下一節將通過延伸Lacan理論中「邪僻快感」之論述來詮釋性地分析「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衝突形構的快感組建機置。

三、「邪僻快感」與「平行共謀式對抗」

筆者將申論，Lacan精神分析理論中的「邪僻快感」概念，在經

過延伸後，將可以捕捉到「平行共謀式對抗」內部的快感新陳代謝。而要充分理解「邪僻快感」這一概念，我們需先理解「謎樣的快感」(enigmatic enjoyment)與「神經質快感」(neurotic enjoyment)。這三者的關係為以下：「謎樣快感」為快感的基礎或原初結構；「神經質快感」為面對「謎樣快感」之一般性的防衛策略，前後躊躇、搖擺不定乃是其特質；而「邪僻快感」則為對「謎樣快感」最極端的防衛性策略，其之所以是最極端的策略乃因為邪僻快感試圖一勞永逸的抹去快感的謎樣特性(Evans 1996: 140)。

(一) 謎樣的快感

在Lacan的快感理論中，追求快感的劇碼展開於大對體(the Other)與主體間，而這一關係的基礎肇發於以下的預設：首先，快感，對於主體來說，乃是永恆地匱缺的(lack)，這一匱缺不是一種經驗性的匱缺，而是一種創構性(constitutive)的匱缺，也就是說快感的匱缺乃一種不可能消滅的結構性存在。第二，在追求快感的路途上，大對體乃主體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指引者。「主體—快感—大對體」三者間的關係基底或可簡化為以下陳述：快感乃為一個主體想極力追求但卻必須由大對體指引，才能暫時性地、不穩定地被尋獲的謎樣存在。

在Lacan的理論中，「大對體」乃是由各種語言遊戲、習慣、規則等等所不一致地(inconsistently)聚合起來的社會場域(field)或「符徵網絡」(network of signifiers)(Lacan 1977: 42-52)，而這一場域經常被主體想像為、感知為一個快感的「基址」(locus)(Lacan 1993: 274)或追求快感時的對話點。大對體可視為Lacan理論中對於「社會」的概念化圖像，這一圖像將社會描繪為一個由各種語言遊戲與規則所不一致地結構起來的場域，其內部充滿不一致性且無法完整自我統合。這一社會圖像固然重要，但在快感分析的層次上時，更重要的是這一社會圖像被主體感知為一個快感基址或對話點的想像。

我們或可用以下的想像性狀況來捕捉上述（從「不一致的場域」到「快感對話點」）的大對體形變：當我們竭力追逐一個目標時，我們盡量蒐集所有資訊、謹慎形塑計畫並用盡每一分可能的努力（簡言之，竭力地跟隨大對體內部之符徵網絡、搜索並遵行大對體內部之規

則叢集)，但最後我們的行動仍然失敗了，當我們看著所有的努力付諸流水，獨自一人時，我們望向天空喊到（或在心裡說到）「你到底想要我怎樣？」³，那一並不實體性存在，但卻是所有吶喊能量所指向的（非人的、非實體的）「你」，作為一個「點」，正是大對體作為一個快感對話點最純粹的形態。

大對體乃主體進行快感追求時最主要的諮詢對象，但如前所述，就實質來說，大對體不過是一組組鬆散地連結起來、無法形成一個統一性整體的非封閉象徵性場域，在面對主體「如何獲得快感？」這一問題時，它最多能給出的是多重的、相互不一致的、非系統性的也無法保證成功的答案。換言之，「如何獲得快感？」這一個「問題」或「謎」結構性地存在於主體與大對體之間。

（二）快感的神經質策略

由上述論述可知，Lacan式的主體受困於由不可能解決的快感之謎所架構起來的與大對體之關係，面對這一令人困惑痛苦的謎樣關係，神經質的快感策略是最容易被啟動的防衛策略，它可以展演出相當多元化的彌補與防衛，最常見的策略為對大對體進行美化的實踐，與看似完全相反的僭越性(transgressive)實踐。

一方面，神經質主體常小心翼翼地跟隨社會中或隱或顯的社會規約或高度關注大對體所推舉的代表性它者（如：人氣政治家、成功的商人或當紅歌手等等），以冀望通過跟隨這些規約指令或模仿代表性它者的行為來獲得「成功」，這一跟隨與模仿常涉及對其高度（或過度）的美化，如過度美化社會中的義行、持續地宣揚自己國家迷人的細節（如：美味的食物、友善的人民）或秘密地流通著關於自己老闆的趣聞軼事等等。這一「過度美化」的傾向難以被化約為神經質主體

3 這一「你到底想怎樣？」（“Che vuoi?”）的問題在Lacan精神分析理論中佔據著重要位置，此一論點為Lacan「慾望的圖表」（graph of desire）中的關鍵。關於Lacan的「慾望的圖表」，請特別參考Lacan(2006: 671-702)。對「慾望的圖表」詳細的解析請見Fink(2004: 106-128)；將這一「慾望的圖表」與當代批判理論接和的有趣討論請參見Žižek(1989: 87-129)。

受到了社會或意識形態的「召喚」(interpellation)這一說法(Althusser 1971)，快感分析更重視這一過度美化的傾向作為一種快感策略，即，此一美化傾向的快感策略之核心在於神經質主體在此其實是在向自己保證自己正在邁向獲致快感的正確路途之上，神經質主體在此其實是在向自己保證自己「跟隨了對的規則」、「生在了對的國家」或「跟對了老闆」。

另一方面，美化大對體之外，神經質主體卻又常常進行僭越性實踐（故意違反律令、做「明知道不應該去做」的事）（特別參見Lacan 1992: 191-204）。前面已經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理論中，主體跟隨大對體律令之實踐不可化約為召喚的效果，在此，相同的，僭越性實踐也難以只用「逃離召喚」解釋。在快感的層次上，這種僭越性快感策略的基礎如下：如果大對體乃快感之秘密的擁有者（而由此誘發主體的尊崇與追隨），大對體也就很容易被想像為**囤積著大量快感，不讓主體分享的自私形象**。神經質主體的僭越性實踐所瞄準的乃是藉由故意的踰越，來從大對體那「將快感偷回來」，這一實踐乃是所謂的「快感的偷竊」(theft of enjoyment)（特別參見Žižek 1993: 200-237；另可見Glynos 2001, 2008），這種「快感的偷竊」涵納的表現很廣，如：偷窺（那個被大對體禁制的空間）、從違規中獲得快感（到那個大對體叫我不去的地方）、愛看知名人物「被虧」或出糗，甚至是秘密地希望成功的同事遭受失敗……等等。

由上可知，神經質主體對大對體的情感樣態可用「愛恨交加」（ambivalence，或曰「情感兩歧」）來形容，因為一方面，大對體被幻想為快感（秘密）之擁有者，而由此誘發神經質主體的尊崇與追隨，但另一方面，快感之創構性匱缺的特質將使得持續持有快感成為一件不可能之事，而由此，神經質主體又對大對體充滿怨憤，並由此誘發僭越性的快感實踐。儘管以上兩組快感實踐（「過度美化」與「僭越性實踐」）在現象面上看似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對反，它們的快感預設是一樣的，即大對體才掌握著通往快感的秘密之鑰，而非主體自己。而「僭越性實踐」並非是相對於「過度美化」的另一個結構，它更接近於對被美化之大對體的怨憤性反動作。

神經質主體面對快感問題時是不知所措的，此一不知所措來自於大對體對快感議題的根本性無能(impotence) 及其律令的多重性與不一致性，如前所述，就實質來說，大對體不過是一組組相互連結起來，但無法形成一個統一整體的非封閉性象徵場域，主體所接收到的關於「如何獲得快感？」的指示將是多重且相互不一致的。此外，神經質主體面對大對體及快感問題的不不知所措不僅表現在前述看似相互衝突的快感表現上，更可見於僭越行為後緊隨而來的「罪疚感」。以Lacan精神分析的理論框架來看，視此一罪疚感和人性善惡相關不如視其為快感的存在性難題，即，「若大對體可以指引快感的迷津，但其律令又如此容易被違反，如果連大對體都靠不住，**那我怎麼辦？**」。和僭越後的罪疚感相關的不是主體的或人類的「本性」，此一僭越後的罪疚感乃一種（關於快感的）存在性焦慮之表達。在以上的論述脈絡下，我們方可引介「邪僻快感」並釐清其特點，因為邪僻快感可被視為用以擺脫快感之謎樣特質與不確定性之終極策略。

（三）快感的邪僻策略

若我們接受以上的論述，則我們應已可看出Lacan理論對於快感之論述非常不同於我們對快感之一般性的與常識性的理解，即，（主體所感知的）快感匱乏並不來自於社會（或大對體）對快感的剝奪，而是正好相反：快感的搖擺與失落導因於大對體的無能、不一致與自私，或是用古典一點的精神分析理論詞彙——其來自於無能與自私的父親。

如果在僭越性實踐中，神經質主體感知的快感威脅來自於大對體自私地囤積與享受快感，邪僻快感的主體所害怕的則是正好相反。邪僻快感的主體永遠在擔心大對體享受得不夠多，邪僻快感之中心策略乃為持續地建構出一個全能的、可見的大對體來支撐主體自身的快感，換言之，邪僻策略的中心操作邏輯為持續地「**使大對體被看見**」（‘make the Other seen’或‘make seen of the Other’）。

持續地試圖「使大對體被看見」的邪僻快感策略所必須克服的主要障礙為「完全再現大對體」之不可能性，此一不可能性來自於前述之大對體內部創構性的不一致、匱缺與非整體化（如同前述，究其實，大對體不過是一組組鬆散地組織起來的語言遊戲、規則、實踐

模式被想像為一個不在場的快感對話點），這種型態的大對體完全不可能達到邪僻快感「完全再現」的要求。為克服這一障礙或不可能性，邪僻快感的策略傾向於挑出並「拜物化」(fetishize)大對體象徵組織的「一小塊」以全權代表大對體，有Lacan學者稱這種邪僻快感所挑出並拜物化的一小片大對體為「想像性律法」(imaginary law)(Rothenberg and Foster 2005)。

想像性律法的內容本身不是重點，它可能是任何一條或隱或顯的社會規則（如：清廉、誠實甚至「義氣」），重要的是其在大對體中的位置與其在邪僻快感策略中的功能。想像性律法本為大對體中許多不一致接合(articulated)在一起的規約群集中的一條，當這一特定規約（這一小片大對體）被邪僻快感策略激活時，它便擺脫了其相對性與接合性而被「幻見似的想像為完全調節，〔它可以〕覆蓋整個〔社會〕關係場域並分配『良善』('goods')」（ibid.: 5，括號內文字為筆者為方便閱讀所加）。邪僻快感策略的主體不是那站在大對體之前，對快感不知所措的神經質主體，邪僻快感策略驅使主體上升到一個和大對體（想像性律法）比肩而立的位置以展示自己「不過是」上帝的「復仇之手」，而邪僻主體將它從它行動中所汲取的快感歸諸於大對體的律令或大對體要求的責任(Zupancic 2000: 58)。

邪僻邏輯的弔詭之處在於其完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任務。在這裡，律法並非快感的反面，相反的，那一小片大對體（想像性律法）成為快感的泉源，邪僻快感生產於主體上升至大對體律令位置的過程，而由此展演出無量暴力，並同時躲在大對體律法的面具之後，宣稱它不過是在「執行任務」而已。如Žižek(2005: 112)指出的：「能夠在施加痛苦於他人之上時宣稱自己不需負責，因為自己不過是大對體意志的代理人，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邪僻主體的快感來自於主體想像自己正站在想像性律法與大對體這一邊的「自我恭賀」，並由此逃脫神經質快感「僭越一罪疚」之惡性循環的難題。

在當代流行文化的場域中，Graeme Turner(1999)所稱的「掠捕式新聞學」(predatory journalism)可說清楚的展演了邪僻邏輯的快感策略。Turner指出，「掠捕式新聞學」的操作涉及藉由一連串技巧佈置

（隱藏攝影機、狗仔隊、脫口秀中「意外」的特別來賓等等）來圍困被報導對象，通過暴露並放大被報導對象的僭越行為以於市民社會中生產（針對被報導對象的）巨量義憤，而這一操作讓市民社會的義憤接近於一種「行私刑暴民的心理狀態」（the lynch-mob mentality）（ibid.: 68）。此外，Turner更指出，以上這一切策略都是在「公共利益」之名下進行。最後，「掠捕式新聞學」常奇異地透露出一種「能高度控制媒體再現技巧的把握，及隨時準備動用這些技巧的信心」（ibid.: 70）。

必須注意的是，Turner這裡所謂的「掠捕式新聞學」和「八卦式新聞」不可直接劃上等號，並非所有的八卦新聞都採用掠捕式的報導策略，後者只是前者的一種類型，但卻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種。以我們前面的論述來說，大多數八卦羶色腥所提供給閱聽人的快感比較接近於神經質快感，閱聽人在此可以一窺名人的私生活、嘲笑名人出糗等等，在這裡，閱聽人是（神經質）僭越的快感主體。相反的，當掠捕式的報導策略進入後，情況變得很不一樣，在這一策略中，「僭越」的不再是閱聽人，而是被報導的對象，而閱聽人則被邀請進入「義憤的守法公民」的位置。這一「義憤守法公民」的快感正是來自於邪僻主體與大對體律法「比肩而立」，而由此生產出的自我恭賀快感。

被激活的邪僻快感策略才是「掠捕式新聞學」最讓人不安之處，而非其報導在認識論層次上的「對／錯」問題（許多掠捕式新聞報導常常在認識論層次上是「對的」，或說是「真有其事的」），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在這一報導策略中，「公共利益」、「律令」甚至是一種已經相當虛弱，（而由此）需要我們疼惜護衛的「良善」竟成了快感增值的工具！⁴

4 此時或為一個適當的時間點說明筆者為何將“perversion”一辭譯為「邪僻」。從正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perverse enjoyment”乃是一種運用律法來生產快感的邏輯，在此，「律法」與「淫穢快感」兩者可說進入了一個相互纏繞、難以分離的狀態，正因為“perverse enjoyment”處於此一「神魔交界」，筆者以（較為脫離傳統的角度）將其譯為「邪僻」。這基本上符合Lacan理論的精神，Lacan強調邪僻快感的中心為「超我」（superego）的座落，Lacan的「超我」概念不同於Freud，Freud的超我強調律令與禁制，Lacan的超我則指涉著「享受！」（“enjoy!”）本身做為一種

(四) 邪僻快感與平行共謀式對抗

筆者現在將通過延伸前述邪僻快感的概念，來解析「平行共謀式對抗」內部快感的新陳代謝。在此我將直接掀開底牌，然後在本小節後續論述中展開這一命題。筆者對平行共謀式對抗的主要詮釋性命題為以下：平行共謀式對抗中的奇異表現——即，「對抗雙方在沒有有效對話的狀況下，卻藉由延長與升級對抗情勢來大量生產並汲取快感」這一現象——結構於兩組由邪僻快感策略所激活的對抗性論述的對峙。

「平行共謀式對抗中的雙方乃兩組由邪僻快感策略激活的論述」這一說法可以馬上幫我們解開這種對抗中的第一個奇異點，即其「平行性」：由邪僻快感所激活的對抗之所以是「平行的」乃因為對抗雙方都分別挑出一部份的大對體殘片（或曰想像性律法）並將其絕對化、拜物化，而由此出現不只各說各話，甚至越講越遠離對方的傾向。於此，對抗的雙方在此並不是在和它者(the other)對話，而是在和自己（所挑出）的大對體（殘片）對話，如紅衫軍的「清廉」、反紅衫軍的「本土」、西方聯軍的「民主」或「（西方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當然還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反西方帝國主義」。但這只解釋了「平行共謀式對抗」中的「平行性」，而無法解釋其「共謀性」。

要分析性地詮釋對抗中的「共謀性」，我們必須首先處理一個明顯的非對應性，即：政治衝突關涉的是「我群」與「它群」的對抗，是「主體」與「它者」的關係，但上面關於快感分析的論述卻都集中在「主體」與「大對體」的關係之間，要如何彌合這一非對應性？筆者的回應是，在Lacan快感分析的論述中，主體與它者間的關係（或曰「它者」的意義），乃是由主體與大對體之間的關係來定位，也就是說，它者「現身」(presence)的形態總是由主體與大對體之間架構的快感策略來決定。⁵

律令(Evans 1996: 200-201)，此外，Lacan也明確指出，「超我同時是律法及其毀滅」(Lacan 1988: 102, 197-198)。

5 當代Lacan學派(或親近Lacan學派)的學者常對「尊重它者」這一口號抱持懷疑態度(參見如Badiou 2001; Žižek 1993, 1997: 45-85, 2002a: 168-178 與205-219)或許和這一分析與概念化的軸線相關。

「它者」的形像總是由特定快感策略所內在地生產出來的。神經質快感的主體最關心的它者多是「代表性的它者」(the representative other)，這種它者是我們所謂的知名人士或「成功代表」，其涵蓋的範圍很廣，它可能是「公認的」成功人士，也可能是主體私底下認知為成功的它者（成功的前輩、在事業路途上高速挺進的後輩或「真正地」在享受工作與生活的同輩等等），簡言之，神經質快感中的它者是被主體感知為有權力、有快感的人，對神經質主體重要的它者都是這種它者，因為這些它者正是大對體的擬人化現身，是主體欣羨仰望但又常常極端忌妒、容易誘發出主體對其有意識或無意識之攻訐的目標。

相對於神經質邏輯中的它者之「自身」或「內在」的特質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它們是「成功」的人，不管這裡的「成功」定義有多廣），邪僻快感之它者的內在質性則完全不重要，因為它者在邪僻快感中只被用為建構出一個全能可見之大對體的「材料」或「手段」，它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已經被社會邊緣化、最弱勢的個人，因為它者在邪僻快感策略中扮演的純粹只是被聖化之那一小片大對體（「想像性律法」）之**絕對反面**的角色，它將被用於展現邪僻大對體的權力，簡言之，邪僻快感的它者必然是一個「可用於獻祭的它者」。再一次的，掠捕式新聞策略在此是一個極佳的例子，掠捕式新聞學之所以會用各種技巧佈置來誘捕、圍困被報導對象乃因為其目標在於再現被報導對象為「公共利益」（「誠實」、「勤勞」等等）之**絕對反面**。

在理解了邪僻快感策略中「主體—它者—大對體」的邏輯結構後，我們現在可以正面面對「平行共謀式對抗」中的「共謀性」了。在共謀式對抗中，對抗雙方皆傾向於將自身大對體中的一小部份拜物化（「想像性律法」），並將自己上升到「與這一拜物化之大對體」等高的位置，以與大對體共同面對、懲罰那被幻見式地建構為絕對反面的邪惡它者，以使自己成為「自我恭賀的主體」。這表示，在共謀式對抗中，被邪僻快感激活的雙方都秘密地希望對抗中的它者**「真的就是（我想的）那麼壞！」**，我（主體）才可以繼續炫耀我與那拜物化的大對體殘片站在一起的事實，我才可以繼續當我那「自我恭賀的主體」。純以快感形構的角度來說，共謀式對抗中的邪僻主體並不希望對抗中的它者「變好」，因為這會瓦解其快感形構。在被邪僻快感

激活的共謀對抗中，雙方都希望保持並增強其自我恭賀的快感，以致於怪異地，雙方都不希望看見對方的善意，雙方皆希望對方「就是那麼壞！」。在這一快感形構下，對抗的強度傾向於邏輯性地、結構性地升高，因為這一「對抗態勢的持續升高」之位勢所持續支撐、增強的正是邪僻策略中自我恭賀快感，正因如此Baudrillard會說，911事件中「他們所幹的，正是我們所想要的」！

若我們將「平行共謀式對抗」視為一種政治衝突的邏輯形構而非必然黏附於特定政治對抗事件中，則我們可以在許多其它的政治對抗衝突發現它的蹤跡。儘管紅衫軍事件與911事件或兩次波灣戰爭間不管在地緣政治、事件成因、對抗強度等等面向上天差地別，但若我們分析紅衫軍事件中媒體論述的對壘，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平行對抗」與「共謀式對抗」的現身。

首先，如本文開頭所述，紅衫軍事件中的「反貪腐vs.保衛本土政權」清楚呈現出衝突的平行性，好似「反貪腐」和「保衛本土政權」兩者間完全不相容一般。此外，絕對反面的它者持續被生產出來：反紅衫軍的媒體論述在「保衛本土政權」時不斷剪接、塑模紅衫軍為台灣本土政權頭號敵人——毛澤東的紅衛兵；如紅衫軍開始於2006年9月9日正好是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所以紅衫軍是在〈向毛主席致敬？〉或〈老毛忌日 紅衣靜坐唱和〉⁶；施明德則是〈躍升的紅星〉⁷；紅衫軍凱道靜坐則是〈中國人在紅色凱道站起來了〉、〈凱道紅潮超限戰〉或〈超限戰的極致：使其不自覺站在敵人的立場〉⁸；而被紅衫軍靜坐的凱道則成了「紅場」⁹。另一方面，支持紅衫軍的媒體論述在「反貪腐」時則不斷強調紅衫軍都是自己坐捷運、計程車、公車來到抗爭現場，而相對的，紅衫軍的對抗它者則都是作

6 自由時報，〈向毛主席致敬？〉，2006/9/5；自由時報，〈老毛忌日 紅衣靜坐唱和〉，2006/9/9

7 自由時報，〈躍升的紅星？〉，2006/9/21

8 自由時報，〈中國人在紅色凱道站起來了〉，2006/9/16；自由時報，〈凱道紅潮超限戰〉，2006/9/12；自由時報，〈超限戰的極致：使其不自覺站在敵人的立場〉，2006/9/26

9 自由時報，〈施明德的「矛」攻「盾」〉，2006/10/8

遊覽車來的，由此暗示紅衫軍乃道德的自主公民，而其對抗它者則都是被貪腐政權動員來的「稻草人」¹⁰。

自我恭賀的快感更是具體呈現於雙方論述之中：支持紅衫軍的媒體論述不斷的強調反紅衫軍聚會的場合中充斥著高分貝的咒罵、施明德前妻在入口賣施明德的「求饒衣」複製品、檳榔、夾腳拖、全都是老人，相對於紅衫軍的聚會中則都是大學生、女性、皮偶戲、鄉村音樂、蕾舞表演、小提琴等等，由此，〈昨夜／〔紅衫軍的〕微笑讓台北變得更偉大〉¹¹！另一方面，「保衛本土政權」的媒體論述則指出，紅衫軍與施明德這些人都是中國攻台巨大棋盤中的一小步而已，但不管他們的陰謀如何細緻，都不會成功，所以，「走筆至此」，我們「內心既沉重又欣慰。因為，無論這群『聰明人』如何處心積慮……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台灣人意識』的強度，已經宛如樹根抓住土地般，強悍地固守著這塊土地……痛打阿扁的拳，就像打在台灣人身上……就是這股強大的『台灣本土意識』，總會在最關鍵的歷史時刻……匯集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捍衛台灣。是的……我靜靜低首默禱：天佑吾國，天佑台灣！」¹²。自我恭賀的快感以幾乎是可以被觸摸到的具體性存在於這些報紙論述中！

面對紅衫軍事件這個2006年台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面對這個當年被某知名評論家（或許過於誇張地）描繪為在「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島嶼，居然出現單場示威人數即達百萬，在近百年全球政治史上

10 參見如：中國時報，〈倒扁紅潮機動挺扁綠蟻死忠〉，2006/9/20；中國時報，〈上千輛遊覽車圍住中正紀念堂〉，2006/9/16；聯合報，〈500輛遊覽車北上挺扁〉，2006/9/14；聯合報，〈台灣站起來 動員150輛遊覽車〉，2006/9/30；聯合報，〈916圍進團出 民進黨1車補助1萬8〉，2006/9/15；聯合報，〈遊覽車往哪裡躲？〉，2006/9/15；聯合報，〈亮車票 自掏腰包〉，2006/9/16

11 聯合報，〈昨夜微笑讓台北變偉大〉，2006/9/16。另可參見如：聯合報，〈中產階級多咖啡店、超商熱賣〉，2006/9/10；聯合報，〈一樣的月光 紅綠兩樣情〉，2006/10/8；中國時報，〈自發自律展現中產階級特色〉，2006/9/16；聯合報，〈阿扁小心當媽媽的不好惹〉，2006/9/16

12 從今日的角度看，這一段文字看來特別一廂情願，甚至極不理性，但這些文字皆實際刊載於自由時報，〈斬首行動的死亡拼圖〉，2006/9/22。

已無前例」(南方朔 2006: 180)的運動,我們現今社會卻對其展現出高度的沉默甚至羞恥,這沉默與羞恥是否和我們(不管當初是贊成或反對)其實模糊地知道,自己當年曾經把這個運動當成噴發自我恭賀快感的基址,而由此未能適當利用當年由歷史偶然性地(contingently)提供出來的政治機會有關?這驚人巨大的沉默與羞恥難道和我們自己其實知道我們當年曾經享用過邪僻快感,以作賤我們的同胞無關?

今日,網際網路、社群網路與數位/行動媒體已大幅改動當代媒體環境,同時也巨幅且快速的改變當代社會—政治運動的構成方式。和今天以網路為主要動員方式的公民運動——如:1985公民聯盟為大兵洪仲秋之死所發起的白衫軍運動——相比,紅衫軍看來已是「老一派」的運動了:紅衫軍由大眾媒體動員,由施明德這位當年的民主英雄領頭,且其間參雜了複雜的社會、族群問題與政黨謀略(儘管紅衫軍當時曾極力試圖擺脫這些制約),相對的,白衫軍由數十位一般市民通過臉書發起,不但大幅壓縮了運動成本,也在繞過既有政治勢力的狀況下高速集結公民,此外,相對於紅衫軍和施明德的個人英雄形象之密不可分的关系,白衫軍的發起人通過刻意迴避媒體(在接受媒體訪談時,發言人甚至故意背對鏡頭且堅不露臉),反而偶然地促成了一個真正抽象的網路公民形象——領導人不需要有「臉」,不需占據鎂光燈焦點,因為這是一種理念式的人群集結。

這種以網路的「地下莖」(rhizome)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模式聚集,並繞開既存政治勢力的人民集結十分類似於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 (2004)所說的「諸眾」(the multitude)。與Hardt和Negri相同,筆者對於這樣新型態的人民聚合抱持興奮與高度期待,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地下莖式的諸眾集結不會因為其動員結構的特殊性(主體自主、自發地通過資訊連結)而自動地導向政治解放。在台灣媒體對洪仲秋案的報導中,我們仍可以相當明確地看到意識形態的現身:通過將軍方人員妖魔化,許多大眾媒體的論述將案件框架為「黑幕重重的集體謀殺」,案件重點被置於「從重量刑」而非針對軍中沉苛體制的批判與分析。網路—市民社會內不但許多人接受這種論述方向,更以自己當兵經驗為基礎而生產出大量論述共鳴而由此加入意識形態論述的漩渦,這一種「諸眾」顯然無助於政治改革。

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上述「大眾媒體論述」與「網路—市民論述」之相互共鳴(resonance)中所生產出來的「邪僻快感」與「自我恭賀主體」。要知道台灣男人對他的當兵經驗是強烈地愛恨交加的：恨！——恨當兵的苦、委屈與折磨；另一方面，愛！——很少碰到一個男人（包括筆者自己）不愛談這些苦、委屈與折磨，以展現自己是受過磨難的「真男人」！白衫軍的議題剛好與社會中一半的人口（男人）生命中情感投資非常強烈的記憶共鳴，這大大加強了白衫軍的力量。面對這一態度的事件，邪僻快感很容易直接掌控其走向，因為藉參加、談論這一運動，男人既可以談他的愛，又可以表現他的恨，嘴上所說與心中所念的多是當年的軍隊黑幕與數年的受苦，而由此來進行自我恭賀，而非軍隊體制與許多軍中怪異潛文化的改革可能性。

最後必須特強調的是，儘管筆者認為在網路公民白衫軍中明顯地感知的到「邪僻快感」與「自我恭賀之主體」的痕跡，這並不能用來否定白衫軍的行動，評斷人民運動時，其創造出的希望與可能性仍是重要面向，在此點出白衫軍公民運動中所潛藏的「邪僻快感」與「自我恭賀主體」只是一種批判性提醒。本文對此案例只停留在批判性提醒的層次，原因不只是案例分析非本文重心，更是因為本文所規劃的論證範圍只在於分析性地描繪「平行共謀式對抗」中的快感運作機制，而非政治解放的主體樣態，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我在後面將再次回到研究論述限制這一問題），但必須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對一個人民運動提出批判性的提醒與對同一運動的力量感到期待與希望這兩種態度是可以並存的！

四、「共謀式對抗」與基進民主理論

這一小節的目標為將「平行共謀式對抗」的概念置放入由後結構主義所啟發的基進民主政治理論中。筆者希望透過將此一概念置放入基進民主政治理論論述來突顯此概念的特殊性、限制性及其與當代政治現象的關聯性。

筆者在此的主要命題為以下：在後結構主義基進民主的脈絡

中，「平行共謀式對抗」模擬出了一種「衝突／對抗」之政治性潛力 (political potentiality) 被帶向意識形態封閉 (ideological closure) 的模式。

由理論家Ernesto Laclau所代表的基進民主為當代基進民主理論傳統中相當重要的一支。¹³Laclau在其近作中，曾短暫地提到類似本文所說的對抗中的共謀，他指出，若一個政治對抗中缺乏「異質性」 (heterogeneity)，則這一對抗將創造出一個僵化的衝突框架，並由此使任何的社會場域變動成為不可能 (Laclau 2005: 140-141)。此外，基進民主研究者Sean Phelan與Lincoln Dahlberg(2011: 27-29)也指出，在基進民主理論中，有兩種意識形態的展演策略，其一為將所有的衝突轉換為和平共處的「差異」，由此穩定住既有秩序；其二為衝突將社會切割為「僵化的」兩方對抗，而由此讓真正的變動成為不可能。將後者這種「政治衝突或政治對抗自身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說法置入Laclau所代表的基進民主理論座標中，我們方可理解這一陳述在理論層次上的重要性。

在Laclau所代表的基進民主學派中，意識形態指涉的是一種很特別的「誤認」 (misrecognition)，意識形態並不讓我們誤認現實，它主要目標甚至不是讓我們誤認或自然化社會內部的權力傾斜，在這一理論傳統中，意識形態遮蔽的是社會「實證性」 (positivity) 中必然包含的「危疑特質」 (precarious character) 與既存秩序之「終極縫合的不可能性」 (impossibility of ultimate suture) (Laclau 1990: 92)。簡言之，意識形態遮蔽的乃是社會秩序之偶然性 (contingency) 與可變動性，這一（內含於所有的建構物中之）不可能被取消的可變動性潛力則被命名為「政治性」 (the political)。由此，在這一套理論中，意識形態的對反（或意識型態所試圖掩蔽的）並非現實或權力結構，而是「政治性」，即：意識形態遮蔽政治性。這一學派強調「對抗／衝突」之政治潛力正因

13 根據Sean Phelan與Lincoln Dahlberg(2011)還有Jeremy Gilbert(2008)的說法，基進民主的另外一個重要傳統為由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所代表的「自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autonomist Marxism)，對其理論較為清楚的鋪陳，可特別參見Hardt and Negri, 2004；在中文文獻部份，一個清晰的批判性引介可參見萬毓澤(2006)。

為「對抗／衝突」象徵化了「社會之封閉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closure)(Laclau and Mouffe 1985: 122)，對抗與衝突的存在揭示了現存社會、政治與經濟形構之「可複寫性」(iterability)¹⁴(Derrida 1988)。綜觀Laclau的著作，他從未放棄過「衝突／對抗」為開發「政治性」潛力之最常見也最不可或缺的策略這一說法，換言之，「衝突／對抗」不只含納了變動的可能性，更是誘發變動最重要的政治策略(Laclau and Mouffe 1985；Laclau 1990, 1996, 2005)¹⁵。

這一對於政治「衝突／對抗」的強調並不是沒有在後結構主義的政治理論傳統中引起爭論。Laclau最重要的理論夥伴Chantal Mouffe (2000, 2005)即寫作了許多文字試圖以「競爭的政治」(agonistic politics)來代替「衝突／對抗的政治」，Mouffe強調，在競爭的政

14 「可複寫性」為Derrida在解構性地討論John L. Austin著名的「語言—行動」理論時所生產出來的概念（請參見Derrida 1988，相關解釋請見Gasche 1986：212-217；Lucy 2004：59-61；Weber 2008：122-128）。此一概念強調任何記號都可被抽離出其所在的脈絡，並在其他的脈絡中予以重複(repetition)，而這一重覆將為此一「舊的」記號在新脈絡中創生出新的意義與生命，這是一種通過重複而於同一記號內部創造差異的力量，換言之，前述的「抽離」與「重複」的動作並不會摧毀一個記號，相反的，它們讓記號的意義離散與繁化，而由此讓此一記號更為「成功」，此外，Derrida更指出符號的「可複寫性」說明了語言內部之「先驗性」存在的「裂隙」(“cleft”或“dehiscence”)(Derrida 1988: 18)，此一裂隙關涉符號內部之新生與茁壯的力量泉源。在Derrida後期較明顯地轉向政治議題的著作中(特別是Derrida 2005)，此一概念表達之邏輯仍然相當清楚地存在於其論述中，譬如其對「民主」(democracy)的論述。Derrida強調「民主」在當代獲得幾乎全球性的尊重，幾乎所有政體都言必稱「民主」，而「民主」在從西歐被搬動到全球後，其在各種脈絡中的重覆已引導出多樣化的民主形式，換言之，沒有單一的民主(democracy)，只有複數的民主(democracies)，這一通過重複而繁化了的「民主」建構其今日的全球成功。在此用「可複寫性」乃試圖強調以下命題：若既有秩序不可能完全封閉，而其內建的「裂隙」為其不可避免的宿命，則政治改革不一定要通過Žižek所言的革命化「政治行動」(the political act)(Žižek 2002b)，我們也可以通過既尊崇原有秩序、理念與符號又對它們的內涵予以改動來進行政治改革的想像。

15 Žižek早期的著作也跟隨Laclau這一說法，如Žižek(1989)。即使Žižek後期觀點已和Laclau分道揚鑣，Žižek仍然高度重視且常常引用Laclau理論中視「對抗／衝突」為具有政治潛力與最重要策略的說法，如Žižek(1999: 172-173; 2002b: 209-210)。

治中，它者或它群被視為「對手」(adversary)而非衝突／對抗政治中的「敵人」(enemy)(Mouffe 2000, 2005)。Laclau的學生Aletta Norval(1997, 2004, 2007)則一直認為Laclau對於「衝突／對抗」的過度強調容易使他的理論忽略政治行動中更為細緻的面向。Lasse Thomassen (2005)則警告，過度強調「衝突／對抗」很容易引致意識形態的封閉，他首先舉出的例子即為英美的反恐戰爭，他指出反恐戰爭作為一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抗，其態勢已經很明顯的進入意識形態封閉的狀態，這一對抗只是鞏固並加劇了雙方勢力與論述的既有形態，這一說法和前述Baudrillard的見解可說相當類似。此外，Thomassen也舉出了Sebastian Barros 和 Gustavo Castagnola (2000)對阿根廷「裴隆主義」(Peronism)的研究來進一步強化他的警告，Barros 和 Castagnola的研究指出，不管阿根廷的政治領域中重要的議題如何變動、替換，裴隆主義都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切割線，使任何共識與實質的變動都成不可能，簡言之，一個僵化的衝突框架防制了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筆者在此並不試圖解決這一辯論或於此一論辯中選邊站，筆者只希望將「平行共謀式對抗」置入這一辯論的脈絡中以突顯此一概念的價值。筆者以為，若基進民主理論不準備放棄「衝突／對抗」的政治價值與潛力，則真正的問題似乎並非「衝突／對抗」本身，而是其被組織的方式，也就是「衝突／對抗」的展演形態的問題。

正是在這一論述脈絡下我們能同時看出「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概念的價值與限制。一方面，以上對於「平行共謀式對抗」的討論限制在於，這些討論並不能給予政治衝突／對抗這一政治實踐或策略任何本體論式的定論，也就是說，「平行共謀式對抗」之存在並不能讓我們直接否定政治對抗本身所具有政治生產性。「平行共謀式對抗」的存在只表示政治對抗可能變成意識形態似的存在，但這並不同於所有政治對抗／衝突必然將指向意識形態封閉。另一方面，此一概念的價值則在於其模擬出了一種並非不常見的「衝突／對抗被轉化為意識形態封閉」這一過程的模型，並藉由聚焦在「快感」這一因子上說明這一封閉之組建機制。

最後，我將說明一下「平行共謀式對抗」這一概念與當代政治的相關性。筆者以為這一概念對當代政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形態的對抗／衝突比較容易產生於「人民」與「人民」間的對抗，而非「有權者」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對抗，在「有權者」與「人民」的對抗中，神經質快感策略較常被動用（抱怨政府或資本家之麻木不仁）（參見如 Chang與Glynos 2011）。在我們這個「人民」與「民主」之名已被各種形態政體（至少在口頭上）尊奉的時代，各種類型的政體都已經深知如何動員「人民」並和「人民」結盟，如何避免於政治對抗中生產出邪僻的自我恭賀主體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道德的問題，它已經直接關涉到所有以「人民」之名所進行之對抗性行動的進步性與生產性。

本文所設定的論述焦點與目標為分析性地詮釋「平行共謀式對抗」這種意識形態式政治對抗的快感新陳代謝，這一目標已在前面的論述中完成。筆者在此希望稍微溢出這一設定的目標，簡短談論一下超越上述意識形態政治對抗之可能指向。如前所述，在民主概念已逐漸紮根的國家（如台灣），政治行動所必須面對的似乎不再只是「有權者」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對抗，而是「人民」與「人民」間的對抗。當然，這兩個分類範疇在今天已經相當模糊，因為對抗中的「人民」常常間接地和既存勢力連結或由甚至由後者所動員，在這種狀況下，「人民」不再是（如果它曾經是）一個「無辜的」、具絕對進步性的類目（林淑芬 2005），但另一方面，「人民」似乎仍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類目或行動者，¹⁶在這一狀況之下，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似乎是重新複寫「人民」的意義，我們該問的是：到底哪一種概念化下的「人民」還能承擔民主深化的任務？

16 當然，在當代基進政治理論中，這不是一個所有學者都接受的說法。Hardt與Negri所代表的自主主義即認為「人民」(the people)這一概念是可疑的，因為今日的「人民」乃為數世紀來國族國家建構與召喚的成果，相對地，他們則將希望寄託在由資訊與數位科技連結的、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全球性「諸眾」(the multitude)，這一觀點請特別參見 Hardt and Negri(2004)。

Laclau在其近作《論民粹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除了繼續強調對抗／衝突的政治潛力，他特別加入了一整章的篇幅討論政治對抗／衝突中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重要性(Laclau 2005: 129-156)，會做出這一強調正是因為Laclau意識到了政治對抗／衝突的生產性可能會被僵化的對抗形構所消蝕，Laclau在此強調，「政治轉型所要求的不只是已經存在之訴求(demand)的重新結構，更是將新訴求（即，新的歷史行動者）含納入政治場景中」(ibid.: 153-154)，在這一狀況下，以「人民」之名進行的政治對抗中之異質性所指涉的是「人民」的內涵必須被時時「重新發明」(ibid.: 154)。這一說法和Žižek的「政治行動」(the political act)的概念有相似之處，Žižek強調一個能被稱為「行動」(the act)的政治實踐必須要能改變這一實踐所從出的一整組既存政治座標，如他所說的「介入的行動自身……改變並重構它的座標——一個行動不是非理性的；更確切地說，它創造它自身的（新的）合理性(rationality)」(Žižek 2002b: 243)。最後，在當代政治理論中，沒有人比Jacques Rancière(1999, 2010)更熱衷於重新定義「人民」這一概念，Rancière特別強調「人民」並非人群的集結，有助於民主深化的「人民」應是一個與既存的人民之間存在在一種「補充性」(supplementary)關係的實體(Rancière 2010: 33)，這種「補充性的人民」乃為原本並不被算進(uncounted)既存人民的人群部分，這一「補充性的人民」通過要求被含納入社群之中，而改變社群的整體面貌，這種「補充性人民」的加入不是簡單數量上的「加入一個」，而是一種如同語言般的接合式加入一個字詞，而由此或大或小地改變語意表達的平面。換言之，Laclau、Žižek與Rancière所念茲在茲的都是一個可能改變政治整體面貌的可能性與潛力。

上面所說的都是理論指引，儘管理論的指引作用不能放棄且極端重要，但同樣的指引在不同案例中必然將被轉化為不同的操作（而這些繁化的操作也將更豐富化理論的內涵）。林淑芬在討論Laclau的「異質性」概念時（林淑芬 2006），對觸發紅衫軍抗爭的2006年泰勞抗暴事件做出了非常重要且到位的批判，林淑芬指出，儘管泰勞抗暴事件之初引發了台灣社會譁然，但台灣社會其後的論述接合卻仍執守著既存政治勢力的分野，而觸發這些對抗的泰勞事件反而被擱置一

旁。這一現象其實在紅衫軍的論述中更為清楚，紅衫軍在要求公民道德重整的同時，卻從來沒有將泰勞抗暴事件吸納入其論述中，如上述Laclau、Žižek與Rancière所言，若一個政治行動只是集合了既存勢力的政治實踐，它將很難成爲一個具生產性的政治行動，本文更模擬出基於既存利益與位置所發動的抗爭很容易呈現出「共謀式對抗」的意識形態格局。

在紅衫軍事件所引發的政治對抗中，政治對抗的雙方皆尊奉「民主」之名，只是紅衫軍將民主與「公民道德」連結，反紅衫軍則將民主與「本土性」連結，若任一方將論述重心與泰勞事件接合，則其中對於台灣民主的自我恭賀式護衛，將可以轉換爲一個具有重量的「質詢」：「台灣民主到底怎麼了？」，我們在此將可以瞥見台灣民主的匱缺，並由此藉由泰勞這一群「補充性人民」來轉化人民對於台灣民主「已完成」的感知，並由此啟動民主繼續深化的動力！但是，能搭配這一操作的政治主體性與快感模式爲何？這只有留待未來研究做出進一步的探索。

五、結語

本文引介了「平行共謀式」之政治對抗的形態，並以Lacan的理論說明了這種形態衝突內部快感的新陳代謝，筆者在此宣稱「平行共謀式」的對抗生產於兩組被邪僻快感策略激活的政治力量之對峙。如前所述，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乃因爲其模擬出了一種封閉政治對抗／衝突之潛力並將其帶向意識形態封閉的常見模型，談論這一概念提醒我們注意政治行動與政治對抗的快感面向，因爲此一向並非一簡單的快感道德的問題，它直接牽涉到對抗性行動的進步性與生產性。

本文開頭引用Deleuze的語句乃因爲筆者以爲邪僻邏輯與我們平日所說的「卑鄙」兩者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親近性，被「卑鄙」行爲騷擾時的感覺其實相當接近於成爲邪僻快感之獵物它者，在此，被精細之卑鄙行爲騷擾的主體常極度無助且有苦難言，因爲儘管它能充分感覺到其攻擊的淫穢性，這一淫穢卻在律法之名下執行。

筆者在最後希望補充說明，在純個人的層次上，邪僻快感的主體

是不可能相遇的，因為邪僻主體在快感上是絕對的獨白者。如前指出的，邪僻快感所挑出並聖化的想像性律法不過是極端無助的大對體象徵性空間中許多規則的一條，大對體的場域本是這些規則不一致地、鬆散地接合在一起的非封閉性整體，必須藉由主體的反思、協調、溝通與再接合(re-articulation)才能生產出有意義的整體，但在邪僻快感的操作與想像性律法冒現的狀況下，這些規則間的溝通與接合變得不可能，因為邪僻快感最希望避免的就是這種四散的、不一致的與謎樣般不在場的大對體，每一個邪僻主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並強化自己所想像的大對體型態，他們有可能「聚集」但不可能「相遇」。

不只是Lacan(1977: 170)指出了這一點，Gilles Deleuze(1989: 37-55)更是強調此點，這種不可能的相遇即使在表面上看似互補的邪僻操作中都成立，如乍看之下「天生一對」的施虐狂(sadist)與受虐狂(masochist)。Deleuze即指出，「一個真正的施虐狂不可能忍受一個受虐狂的受害者」(ibid.: 40)，對施虐狂來說，這種受害者甚至可能是恐怖的。以下的簡短笑話便可清楚的表現這種施虐/受虐的非互補性與相遇之不可能性：受虐狂說「打我！」，施虐狂回應道「不要！」。但另一方面，這種相遇的不可能性在純個人化的層次上可能是對的，但是，在政治場域中，我們不可能迴避模擬並解析這種相遇，因為各種主體的相遇及其不可避免性不正是政治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共謀對抗的現象就是這一（在個人層次上不可能出現之）相遇的展現。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Laplanche, Jean and Pontalis, J.-B. (尚·拉普朗虛、尚-柏騰·彭大歷斯) 著，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精神分析辭彙》(*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台北：行人。

朱元鴻。2003。〈那場戰爭不曾發生，眼熟了！〉，收錄於《波灣戰爭不曾發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Jean Baudrillard (尚·布希亞) 著，邱德亮、黃建宏譯，頁7-20。台北：麥田。

- 朱元鴻。2006。〈第四次世界大戰及其共謀，見過嗎？〉，收錄於《恐怖主義的精靈》(*The spirit of terrorism*)，Jean Baudrillard (尚·布希亞) 著，邱德亮、黃宏昭譯，頁7-28。台北：麥田。
- 林淑芬。2005。〈人民作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十二期，頁141-182。
- 林淑芬。2006。〈拉克勞(Ernesto Laclau)霸權理論中的敵對與異質性〉，《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期，頁97-130。
- 南方朔。2006。〈窮巷秋風影零亂——「倒扁」運動後的台灣挑戰〉，收錄於《紅花雨：我們不會忘記的時刻與事情》，楊渡主編，頁180-184。台北：南方家園。
- 陳光興。2008。〈兩岸「分斷體制」：回應白樂晴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一期，頁221-228。
- 萬毓澤。2006。〈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與政治馬克思主義：對《帝國》的脈絡化解讀與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十八期，頁93-149。
- 趙剛。2009。〈民粹文革十五年：重思紅衫軍及其之後〉，《思想》第十一期，頁81-118。
- 劉紀蕙。2000。《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
- 劉紀蕙。2004。《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

二、英文書目

- Althusser, Louis.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27-18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diou, Alain. 2001.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Verso.
- Barros, Sebastião and Castagnola, Gustavo. 2000. "The Political Frontiers of the Social: Argentine Politics after Peronist Populism (1955-1973)," in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edited by Howarth, David, Norval, J. Aletta, and Stavrakakis, Yannis, pp. 24-3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ean. 1995.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2.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London: Verso.

Butler, Judith, Laclau, Ernesto, and Žižek, Slavoj.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Chang, Wei-yuan. 2011.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Enjoyable' Media Discourse: A Lacanian Approach*.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ssex University.

Chang, Wei-yuan and Glynos, Jason. 2011.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Popular Press" in *Discourse Theory and Critical Media Politics*, edited by Dahlberg, Lincoln and Phelan, Sean, pp. 106-12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eleuze, Gilles. 1989. *Masochism*. New York: Zone Book.

———. 2004.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 1953-1974*. New York: Semiotext(e).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elix.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rrida, Jacques. 1988. *Limited In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2005.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vans, Dylan. 1996.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Fink, Bruce. 2004.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Ecrits Closel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Gasche, Rodolphe. 1986. *The Tain of the Mirror: 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Jeremy. 2008.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Radic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Glynos, Jason. 2001. "The Grip of Ideology : A Lacanian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6(2): 191-214.

———. 2008. "Self-transgressive Enjoyment as a Freedom Fetter", in *Political Studies* 56: 679-704.

- airiti
-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 Lacan, Jacques. 1977.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64). New York: Norton.
- . 198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New York: Norton.
- . 1992.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New York: Norton.
- . 1993.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The Psychoses*, (1955-56). New York: Norton.
- . 2006. *Ecrits*. New York: Norton.
- Laclau, Ernesto.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New York: Verso.
- . 1996.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 .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ucy, Niall. 2004. *A Derrida Dictionary*. London: Blackwell.
- Mouffe, Chantal.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 . 2005.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 Norval, J. Aletta. 1997. "Frontiers in Question", in *Acta Philosophica* 2: 51-76.
- . 2004. "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9(2): 139-157.
- . 2007. *Aversive Democracy: Inheritance and Originality in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ssavant, A. Paul and Dean, Jodi (eds.). 2004.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Phelan, Sean and Dahlberg, Lincoln. 2011. "Discourse Theory and Critical Media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Discourse Theory and Critical Media*

Politics, edited by Phelan, Sean and Dahlberg, Lincoln, pp. 1-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ancière, Jacques. 1999.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Rothenberg, Anne Molly and Foster, Dennis. 2003. "Introduction. Beneath the Skin: Perversion and Social Analysis," in *Perversion and the Social Relation: sic IV*,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Slavoj Žižek (eds.). 2003. *Perversion and Social Rel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1-14.

Thomassen, Lasse. 2005. "Antagonism, Hegemony and Ideology after Heterogeneit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0(3), 289-309.

Turner, Graeme. 1999. "Tabloidization, Journal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59-76.

Weber, Samuel. 2008. *Benjamin's -abilitie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1993.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 2002a.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Verso.

———. 2002b. "Afterword: Lenin's Choice," in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Žižek on Lenin*, edited by Žižek, Slavoj, pp.165-336. London: Verso.

Zupancic, Alenka. 2000. *Ethic of the Real*. London: Verso.